

数字城市靠啥“更有数”？

——数据安全法即将实施之际业界人士这样说

本报记者 崔吕萍

由数据归集、分析所形成的信息，可以降低城市运转中的诸多不确定性。如何在保证数据安全、归属清晰的前提下，促进数据流通？

8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个人信息保护法，部分省市也于日前制定了数据条例和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行动方案。结合将于9月1日正式实行的数据安全法，我们如何通过数字赋能让城市做到“更有数”？来听听研究者与实践者的观点。

安全与流动之间有“中间态”吗？

8月20日，中国电子和清华大学联合发布了《2021中国城市数据治理工程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希望在数据安全与流通之间寻找平衡。

“推进城市数据治理工作，必须坚持安全为先。”作为城市数据治理工作的参与者和思考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党组书记、董事长芮晓武提出，当务之急是实现关键数据的安全归集、存储，确保本质安全；以主动安全、主动防御，来防范数据泄露、滥用风险。

要推进城市数据治理，芮晓武认为大数据对城市治理至关重要，但市场上数据的有效供给是不足的，因此必须激活数据要素。

据必须，中国电子自2019年提出“现代数字城市”核心理念以来，至今已与近50个城市展开合作。在这一过程中，芮晓武团

队也深刻地认识和体会到了现代数字城市建设中数据安全和数据流通之间的矛盾。

“我们不仅与近50个城市建立了全面合作关系，同时带动了近5000家企业，与我们一道开展现代数字城市建设和数据治理工作。”中国电子党组成员、副总经理陆志鹏为我们补充了背景材料。在他看来，实践+研究的过程中，比较拧巴的一对儿关系是——安全问题难解决，本质安全难以保障，很多设备来自国外，过程安全日益严峻，制度安全权责不清，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尚不完善；强调安全，则流通受阻；强调数据流通，安全面临挑战；数据要素市场化也面临着定价难、确权难、计量难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如何练就平衡术？陆志鹏说，他们发现了“中间态”。

“我们创造性地定义了‘数据元件’和‘数据金库’的产品内涵和标准，两者共同发挥‘中间态’作用。其中，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条例规定的核心数据和重要数据要入‘数据金库’，把‘数据金库’里的数据进行治理、清洗以后形成标准数据，再将标准数据加工成‘数据元件’，使其在市场上进行流通，并将其加工成数据产品，使数据产业链和价值链有效融合。”陆志鹏表示，下一步，中国电子与清华大学联合课题组将围绕着法律、技术、经济、安全、管理、应用等几个领域，结合最新的法规要求，结合各地的需求，携手生态伙伴，持续地推进数据安全与数据要素一体化治理解决方案不断丰

富和完善。

“已到打开数据新维度的时刻”

推进城市数据治理工作，不能“铁路警察各管一段”，需要强化“联手作战”。

“由于城市数据治理工作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涉及政府、组织、企业等多维主体，涵盖制度、技术和市场等多个系统，是一项创新性、复杂性、系统性工程，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的主体作用和生态的赋能作用，在理论方面，更要强调高校的基础作用。”芮晓武表示。

在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王希勤看来，数据治理虽不是新问题，但在实际工作中却遇到很多新困难。

“现在已经到了打开数据新维度的时刻了，通过数据治理工程消除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治理中的不确定性，让政府运作、经济运行、社会运转、企业运营和个人生活都更加有序可循，也能提升政府、社会、组织运行效率，进而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站在高校课题研究者角度，王希勤这样说。

数据治理怎么才算赋能了城市？

于数据而言，安全是底座，流动产生价值，而于一座城市来说，城市数据治理要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得上赋能数字经济、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建

设了呢？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提出，城市是经济活动的密集区，也是数据产生、汇聚和应用的密集区，开展城市数据治理有利于推动数据资源安全归集、存储和高效配置开发，充分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和倍增作用。

具体而言，江小涓认为，各级政府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主体，要以高水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高质量的政府数据公开服务，实现更有效的制度和政策供给，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要利用数字技术探知经济、企业、产品实时状况，通过多源数据交叉比对，把握事实真相，识别异常现象，实现更有效的经济调控和市场监管；要坚持价值遵循和基本原则，划出底线和边界，对代码、算法等数字技术的基本规则进行有效监管，避免技术滥用和数据歧视，同时把握好平衡，促进数字产业发展、数据权益分配和个人隐私保护协调发展。

在赋能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上，城市数据治理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这一点上，江小涓建议：各级政府要快速提升数字服务能力，本着“应上尽上、全程在线”的原则，推进百姓生活服务和企业商事服务尽快上线，不断增加“一网通办”“一站式”服务事项，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要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数字弱势群体，通过多措并举让他们更好地融入数字发展进程，共享数字红利和发展红利。

要全面准确理解“实现共同富裕”内涵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郑秉文

根据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精神，实现共同富裕的内涵具有如下一些本质特征：

第一，实现共同富裕是指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要富裕。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人民群众提高生活水平的两个侧面。随着经济的增长，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例如，人均GDP水平、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人均住房水平、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指标等。另一方面，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水平也应随之同步提高，后者的基础是前者，二者相互促进，反映的是相应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其中，精神文明日益成为巩固和发展物质文明的条件，对物质文明的发展方向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比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表达内涵的认识和理解越深刻，自主践行就越坚定，对物质文明的发展追求就越有方向感。

第二，实现共同富裕不是指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时一定要注意这样三个问题：一是实现共同富裕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但不可能一蹴而就。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对此要有充分的估计和心理准备。二是实现共同富裕不可能所有人一个早上同时富起来，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一个发展规律，所以要提倡先

富带后富、帮后富，要鼓励那些敢于合法经营和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三是要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人人参与发展的机会，在机会面前人人是平等的，要创造这样一个机会平等的公平环境条件，尤其是向上流动通道的平等机会。

第三，实现共同富裕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共同富裕要尽力而为，要全心全意、不遗余力，2020年在现行标准下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为逐渐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量力而行意味着共同富裕与经济发展同步，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无原则地做出承诺，吊起全社会的胃口。

第四，实现共同富裕要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再次提出“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目的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既体现了尽力而为，也体现了量力而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是逐渐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意指确保民生福祉在生活、医疗、住房、教育的基本保障，是指实现全社会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社会安全网”。

促进共同富裕，急不得更等不得！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刘尚希

共同富裕的充分条件是：社会要通过社会合力来保障所有的人获得基本能力。收入不能替代能力，收入差距缩小了也不等于能力差距缩小了。能力来自社会消费过程。消费的可获得性涉及收入，但消费的可及性与收入无关。

国民基本能力普遍提升，起点公平、机会公平也就有了基础，同时也为创新创业提供了广泛社会基础，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效率与公平的融合也就在其中了。促进共同富裕，要摆脱效率与公平、做“蛋糕”与分配“蛋糕”的困境，只有从物转向人，从财产和收入基准转向消费基准，才能真正做到从物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

从我国现实来看，人的发展既受制于经济，即财产和收入问题，更受制于社会结构的分治状态。

从改革来看，我国虽然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但改革的进展并不全面，这从根本上制约了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这体现在以下三个“二元”上。

一是所有制二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元结构是历史形成的，作为经济基础，从根本上制约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深化。尽管在公共开支上、投资上不再局限于二元所有制，但土地市场、住房市场是二元的，人的社会身份是二元的，农民不只是户籍身份，还有集体经济成员身份。城乡分治就是以二元所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土地、宅基地、农民住房、森林等产权制度改革正试图突破二元所有制带来的制约。

二是经济二元。这个概念是指传统落后的农业和现代先进的工业之间的关系。经济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通过市场化、工业化过程可以逐渐消除。但我国的经济二元结构不只是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之上，也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之上。

三是社会二元。在权利二元基础上形成社会成员身份、基本权利的二元结构，也是社会分配中形成群体性差距，进而形成能力群体性差距的社会根源。

这三个“二元”问题，从发展的底层逻辑上制约我国共同富裕的推进。

促进共同富裕，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当中的一个目标，是走好中国道路的一个基本标志。此事急不得，也等不得。急不得，在于共同富裕首先依赖于发展过程，包括物质发展和人的发展，都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等不得，在于实现双循环相互促进，扩大内需，构建新发展格局、创新驱动发展等，都依赖于共同富裕的边际改进。

群体性消费差距的缩小是当前的重中之重。私人消费与公共消费如何形成合力，以及既扩大短期的内需，又提升人的能力，改变社会预期，至关重要。其中，形成与能力、创新创业和就业相关的良好的分配预期，更是关键。社会的再分配预期需要淡化，人人参与、人人努力的初次分配预期需要强化。

从人的平等发展需要出发来推进各项改革，需要抓住以上三个“二元”结构来完善顶层设计，把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等各方面改革关联起来。这样整体设计才能找出重点和分出轻重缓急。

首个国家绿色技术交易中心成功试水

本报记者 李元丽

8月18日，随着“基于甲醇重整氢燃料电池技术的能源舱系统”以40万元的价格在国家绿色技术交易中心成功摘牌，交易中心成立以来首批共7项绿色技术交易全部完成，累计交易金额超过500万元。

据了解，一项绿色技术从上架到完成交易，历经受理交易申请、资料审核评估、发布交易信息、初步对接洽谈、公开挂牌、确定揭牌方式、合同谈判、组织交易签约、出具交易见证等九个步骤流程。那么，由上海博氢新能源科技公司自主研发的“基于甲醇重整氢燃料电池技术的能源舱系统”又走了怎样的路程呢？

记者了解到，国家绿色技术交易中心在收到上海博氢提交的技术上架申请后，首先对这一系统进行综合评估，认为它属于清洁能源领域的绿色生产技术，符合国家发改委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对绿色技术的认定，可以在交易中心线上平台予以信息发布和挂牌交易。上架后，交易中心技术经理人团队为技术转让方提供了全流程的技术经理人服务。技术经理人团队针对转让的系统从竞品品牌、技术性能差异、价格区间等维度进行了市场调查和需求分析后，认为该技术系统拥有成熟的技术团队，已获得国内外技术专利数十项，技术实力雄厚，且具备可以有效减少碳排放等优势。

在此基础上，技术经理人对该系统的市场需求容量和潜在买家进行分析评估，帮助上海博氢匹配合适的技术购买方，为技术供需双方提供指导和咨询服务，并提供平台和方案支持双方进行技术“云路演”“云对接”，引导双方根据市场行情、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多轮“线上+线下”商业谈判。

“在国家绿色技术交易中心推动下，‘基于甲醇重整氢燃料电池技术的能源舱系统’以40万元的价格成功转化。”上海博氢项目负责人唐潮兴奋地说，非常感谢国家绿色技术交易中心为我们这样的技术拥有方提供专业、高效的技术转化服务。我们的绿色技术从上架到完成交易流程顺畅，而且匹配的交易合作方也是非常优质的企业，我非常满意。

据悉，作为浙江省以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双创中心为主体设立全国首个国家绿色技术交易中心，于今年6月在杭州正式揭牌成立以来，立足“绿色技术交易综合性服务平台”定位，国家绿色技术交易中心针对绿色技术资源分散、绿色技术交易标准缺失、市场主体认知弱等难点，建立了绿色技术综合服务平台，搭建交易渠道，创新服务模式，形成绿色技术陆续上架、在途交易持续推动、平台交易不断实现的良性循环。目前，线上平台每周新上架绿色技术7到10项，在途洽谈20余项，已制定实施22项绿色技术领域重点任务。

从观望、试水到长期投资：

人民币“全球避险资产”功能“圈粉”了！

本报记者 崔吕萍

中国银行业协会于日前发布了《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这份已连续第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全球疫情肆虐的背景下，美联储、欧洲央行在货币政策方面均保持宽松，而我国货币政策则“以我为主，稳字当头”。利率、汇率均在全球市场保持较强的稳定性，人民币“全球避险资产”的功能逐步显现，越来越多的境外主体和资金选择进入我国金融市场。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双向开放进程不断加快，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OFII）、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RQDII）、沪深港通、基金互认、债券通、黄金国际版等人民币投资渠道也陆续放开。全球三大

主要债券指数（彭博、摩根大通和富时罗素）均已将中国债券纳入指数，《报告》认为，这是对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肯定，也是中国金融业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体现。目前，国际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的心态已经从观望和试水阶段转向制定系统性的长期投资计划阶段。

有成绩，也有挑战。去年以来，全球经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影响，陷入严重衰退，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趋势明显，疫情影响下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受到来自内外部多方挑战。

《报告》显示，一方面，疫情危机中各国央行释放大量流动性，美国更是再次开启量化宽松。全球性货币凭借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巩固了全球

流动性供给的地位。中美经贸摩擦未来可能不仅局限在贸易、投资、科技、人才等领域，地缘冲突也可能加剧，这些都将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一定压力。同时，我国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网点开设和经营时间都要少于美资、欧资银行，这也使得人民币在当地金融系统的推广使用力度仍显不够。相比当地货币或美元，以人民币计价的理财和投资产品偏少，境外企业和个人客户可选择的空间有限，这些因素也将影响其增持人民币的意愿。

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在当前经济总量如此庞大的基础上，人民币国际化在下一个十年如何向更高水平迈进，也是摆在各市场主体面前

的重要课题。

而立足当前，《报告》提出，随着境内企业“走出去”稳固推进，跨境人民币贷款“借、用、还”的闭环流转生态已经逐渐形成。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对外承包工程项目不断开展，贷款融资需求持续增长。同时，我国经济和综合国力不断发展，石油等大宗商品人民币直接计价结算具有较大发展空间。为更好地服务“走出去”企业，《报告》建议下一步银行业应重点关注中资企业人民币融资需求，扩大人民币使用比重；对大型跨国中资企业提供境内外联动的全流程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和共建国家的项目业主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对还款来源为外币收入的贷款业务制定远期结汇方案；对优质诚信企业提供便利化试点服务。



“小小蒸笼”织就共富路

日前，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江镇镇村民正在家门口就业，制作竹蒸笼。怀宁县江镇镇2万多农民在全国各地用一个个不起眼的馒头包子，每年“蒸”来10多亿元的收入。同时也带动了蒸笼业的发展，该镇年产蒸笼30余万套，创产值超亿元，涉及蒸笼业相关毛竹、制作、运输等行业从业人员多达几百人。

贾宁 檀志扬 摄

全国政协常委赵雨森：

助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本报记者 李元丽

“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和协同推进，既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培育长效脱贫机制，又有利于促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全国政协常委、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民盟黑龙江省委会主委赵雨森强调说。

赵雨森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当前在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还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如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不高，产业扶贫项目收益率不均衡，非贫困村与贫困村的发展出现新的不平衡，防返贫致贫保障机制需进一步完善，扶贫产业稳定带贫能力还需进一步加强等。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在更高质量、更高要求上系统谋划。

如何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进行有效衔接？在赵雨森看来，要优化资源配置，立足当前和兼顾长远，城乡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引领脱贫攻坚新局面。通过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引领和推动要素、资金、公共服务向农业农村倾斜，逐步补齐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公共服务、治理能力等发展短板。如，在扶贫产业发展中要注意克服以牺牲长远利益为代价的快速发展，在实施“短平快”扶贫项目的同时，更要谋划长远之策，避免运动战、坚持持久战。同时以乡村振兴战略激发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和外活力，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稳扎稳打，使脱贫“永不反弹”，发展“永不止步”，城乡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引领脱贫攻坚新局面。

“此外，在巩固脱贫成果的前提下，帮扶措施原则上应该一视同仁，平等地向全

部农民提供就业创业机会和扶持。”赵雨森表示，面向后扶贫时代，健全体制、机制，加快推动重点扶贫向普惠平等方向转变。尤其要把乡村振兴各方面资金的投向与实际需求相结合，进行均衡分配，帮扶导向逐渐转向营造普惠的发展环境，扶贫政策逐渐并轨到常规性的乡村振兴政策体系。同时推进扶贫产业向乡村产业转化，促进产业提档升级，发展壮大脱贫地区特色产业群，继续发展“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做强重点项目和主导产业，提高产业厚度，提升产品品质，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积极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产品，加快挖掘培育高效生态农业品牌，以产业项目带动整体经济快速稳定发展。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变化，各地要适时进行政策调整，加快政府职能归位，把行政配置资源‘输血’与市场配置资源‘造血’相衔接，从脱贫攻坚阶段的行政外在推动为主，转向乡村振兴阶段的市场内在推动为主。”赵雨森表示，进行政策调整，推动政府职能归位，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发展模式和理念。如，对脱贫攻坚政策全面梳理，把教育、医疗等涉及民生领域的扶贫政策作为常项政策继续实行以确保巩固脱贫成果；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作为增量政策加大执行力度以满足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需要等。“最后，我们还要加强政策引导，抓好人才建设，夯实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共同核心基础。下一步，要以需求为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全面摸排乡村振兴各领域人才需求，为人才队伍安排合适的岗位、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赵雨森最后说。